

历史的观念译丛
Series of Ideas of History

16

人人都是他自己的
历史学家
论历史与政治



〔美〕卡尔·贝克尔 著
马万利 译

Everyman His Own Historian
Essays on History and Politics

Carl L. Becker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31年，卡尔·贝克尔就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发表著名演讲“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生动阐释了相对主义的历史观念。本书是卡尔·贝克尔的论文选集，收录有关历史学与政治学的论文十七篇，讨论亨利·亚当斯、韦尔斯、特纳、马克思等人的史学思想。本书集中体现了贝克尔的治史理念，也显示出其老辣而精巧的文字特点。

013

把历史看作对曾经存在的现实的一种节略的、不完美的再现，看作一种为满足那些以史为鉴的人的需求而对不稳定的记忆模型所做的重新设计和粉饰，既无损于历史的价值，也无损于历史的尊严。我们所能完成的目标是有限的，我们的贡献也只具有偶然的、暂时的意义，但这并不影响对我们的劳动做出高度的评价。

——卡尔·贝克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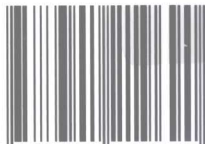
在我的记忆中，贝克尔的“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是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就职演说中最好的一次。

——普里泽夫德·史密斯 (Preserved Smith, 1880—1941)

卡尔·贝克尔确实有一种精妙的风格。

——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 (F. J. Turner, 1861—1932)

ISBN 978-7-301-21969-0



9 787301 219690 >

定价：40.00元

历史的观念译丛

人人都是他自己的 历史学家

论历史与政治



〔美〕卡尔·贝克尔 著
马力利 译

Everyman His Own Historian
Essays on History and Politics

Carl L. Becker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美)贝克尔(Becker, C.)著;马万利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2

(历史的观念译丛)

ISBN 978-7-301-21969-0

I. ①人… II. ①贝…②马… III. ①史学理论-文集 IV. ①K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11744 号

Everyman His Own Historian: Essays on History and Politics

by Carl L. Becker(1873-1945)

中文版依据美国芝加哥 Quadrangle Books, Inc. 1966 年版译出

书 名: 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论历史与政治

著作责任者: [美] 卡尔·贝克尔(Carl Becker) 著 马万利 译

责任编辑: 岳秀坤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1969-0/K·0930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pkuszs@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印 刷 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 开本 19.75 印张 1 插页 277 千字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0.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历史的观念译丛》总序

序 一

在跨文化交流不断加强的当下,如影相随的是,我们面对着全球化时代的一种紧迫要求,即必须更好地理解文化差异及特殊性。由中外学者携手组织的这套丛书,将致力于把西方有关历史、历史编纂、元史学和历史哲学的话语带入中国历史文化的园地。

历史论题是人类生活中极其重要的元素。在历史中,人们形成并且反映了他们与其他人的认同感、归属感,以及与他者的差异。在归属感和差异的宽泛视界中来看待“世界诸文明”,人们才能够谈及“文化认同”。历史学家们的专业学术工作往往涉及到并依赖于认同形成的文化过程。由于这种牵涉,无论历史学家是否意识到,政治都在他们的工作中起着重要作用。不管学术性的历史研究仅仅只是作为资政的工具,还是因其方法的合理性而有着特别功能,这都已经是公开的问题。

关于历史思维的学术地位的许多讨论,还有它对“客观性”或普遍有效性的执著,都与世界范围内现代化过程中的历史思维之发展联系在一起。在这一过程中,历史思维获得了学术学科或者说“科学”(Wissenschaft,采该词更宽泛的意义)的形式。历史学研究的传统,其自尊就在于,它声称与非专业历史学相比有着更高层次的有效性。一般用的词就是“客观性”。与这种对客观性的执著相反,许多重要论述进入了历史学家的自我意识,这牵涉到他们与各自国家历史文化的相互关系。例如,后现代主义极力否认客观性这种主张,并且指出,尽管历史研究有其方法的

合理性,而在历史研究之外的政治利益、语言假定和文化意义标准等等,历史的解释却对它们有一种根本的依赖。

在意识到了记忆的作用,并且意识到了非专业性因素在异彩纷呈的人类生活领域中表现过去的作用之后,发生在历史学内外的、有关历史思想以及它作为学术学科的形式讨论,就因这种新的意识而被扩大了。在人类生活的文化定向中,记忆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它似乎要取代历史在那些决定历史认同的行为中所处的核心位置。这样一种更迭是否会造成足够重要的后果,影响到历史在民族文化生活中的角色,这一点还悬而未决。只要记忆与“实际发生的”经验相关,历史就仍然是对集体记忆中这种经验因素的一种言说。

在反思历史思想与职业历史学家的工作时,这种视界的扩展因为如下事实而获得了额外的扩大和深化,即:人们为了理解现在、期盼未来而研究过去的方式存在着根本的文化差异;没有这样的洞见,就不可能正确地理解历史。既然认同关系到与他者的差异,而历史是呈现、反思和交流这种差异的领域,历史学家的工作就必然一直处在对付这种差异的张力之中。“文明的冲突”便是一个口号,它标明,通过回忆和历史形成的认同中存在着紧张因素。

既然认同不只是界定和奋争的事情,它同时还是理解和认知,为此,这双重因素在历史话语中都必须主题化。每一种认同都因识别出他者而存在,而各种认同或认同的文化概念之间的张力以至于斗争或冲突,都不得被理解为一种认知的要求。是什么使得他者出现差异呢?对此不理解,认知就不可能实现。这样,就必须了解他者的差异中那些强有力的文化要素和过程。

进而,若缺少贯穿这种差异的可理解性原则,认知也不可能。就学术性话语的层面而言,在将历史认同主题化,使之成为差异的一个事例时,这些普遍的要素和维度与专业性历史思维的话语特征有着本质上的关联。

这就是本丛书的出发点,它想把西方世界人们理解、讨论、扩展、批判和利用历史的途径告诉汉语世界。

这套丛书可谓雄心勃勃,它试图展现西方历史话语的整个领域。在思考历史的西方人眼中,西方历史思想是什么?谁的观点成了有影响的

观点？想象一种单一的西方历史思想类型，并以之与非西方的中国人或印度人的历史思想相对比，这相当容易。但更进一步，人们就会发现，西方并没有这样一种类型，即单一的“观念”、“概念”或者“根本”。相反，我们找到了一种话语，它呈现出各种不同概念、观点和实际作用之间错综分合的交流。这套丛书便展现了这种多样性和话语特征，当然，非西方世界也会有类似情形。

本丛书分为作者论著和主题文集两类出版。第一类选取该作者对历史话语而言有着重要地位的作品，第二类则选取历史话语中的一些中心主题。每一卷都有介绍该作者或主题的导论、文本注释和文献目录。

本丛书期待对历史学领域中在新的层次上并且是高质量的跨文化交流有所贡献。抱着这种呈现更广泛的意见、立场、论证、争执的雄心壮志，它希望成为跨文化交流中类似研究的范例，使不同文化彼此得到更好的理解。在跨文化交流与对话的领域内，就一种对文化差异彼此了解的新文化来说，这种理解是必要的。

耶尔恩·吕森

2006年5月于德国埃森

序 二

近代以来,西方历史思想家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思想资源。历史的观念经过一代代思想家的演绎,构成了多元的话语系统,而且,这个系统还随着思想家们不断的思考、表现而获得扩充。

我们往往通过书本了解思想家们对历史的看法,但对于读者自身而言,我们却不能只是从书本中去理解历史。事实上,我们就生活在历史中,这并不是说我们现在的经历将成为历史,而是指我们身边的每一处能够被言说、被体悟的事情,如果不能获得历史解释,它都无法进入理性的思索之中。从历史中获取意义,获取人生在某个时刻具有的确定性和行动的立足点,这是试图了解历史的人所追求的。但这样一种能力对于个人而言并不是可遗传的或可积累的,每个人都不得不在自己的生活中重新发展它。思想家们对过去的理解与认识、对历史这个观念的思考,以及对与历史相关的一些问题的探询,这些都只为我们耕耘未来生活这块荒原提供各式各样的工具,却不提供秋收的果实。

系统地译介西方史学理论或历史哲学作品,一直是20世纪以来几代中国学者的梦想。这个梦想曾经深藏在何兆武先生年轻的头脑中,此后,他身体力行,译著丰卓,为拓展国人的历史思维付出了不懈的努力。如今,跨文化交流的加强,以及国内学术事业的繁荣,使得这一梦想更有可能变为现实。

本丛书有幸得到了德国学者耶尔恩·吕森教授的大力支持。吕森教授认为,加强跨文化交流有利于创造一种新的世界文化,现存诸种文化可以包含在其中,但它们了解彼此的差异,尊重彼此的习惯;平等交流使得我们可以跨越文化鸿沟,同时拓宽我们理解历史的文化限度。这也是中方编辑者的初衷之一。这样,中德双方组织者表现出极大的热忱。从丛书框架、选题的设计,到约请编译者,乃至沟通版权,一项项艰巨的任务在数年来持续不断的交流与努力中逐渐得到落实。

丛书编者有着极大的雄心,希望以数十年的努力,将西方18世纪以来关于历史、历史编纂、元史学和历史哲学的重要文献渐次翻译,奉献给汉语世界。如果可能,这套丛书还将涉及非西方世界史学思想的文献。

显然,这套丛书的出版是一项跨文化交流的成果,同时也是一项民间的学术事业,在此,我们要对所有帮助这套丛书出版的编者、译者、出版者表示感谢。愿这样的努力,也能够得到读者的关注、批评与认可。

张文杰 陈新

2006年5月

卡尔·贝克尔的生平与学术(代译序)

马万里

卡尔·贝克尔(Carl Lotus Becker, 1873—1945)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近些年,贝克尔的名言“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在国内知识界流行开来,贝克尔的史学著作和思想开始引起知识界的注意;这反映出新时代里人们兴趣点的微妙变化,也说明贝克尔史学思想的持久魅力。但要想更加充分地理解这句话的深刻含义,了解一下贝克尔的生平与著述应该是有益的。

1873年,卡尔·贝克尔生于美国中北部爱荷华州黑鹰县的一个农场家庭,出生不久随父亲迁到附近的一个小镇上,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光。这座小镇名叫“滑铁卢”,这可能让人联想到拿破仑的那桩伟业。实际上,这是一个远离东海岸美国文化中心的古朴而边远的小镇;东部大都市对于小镇上的居民来说,几乎与法国同样遥远,甚至于,“人们对大企业以及东海岸的优势——无论是文化上的、经济上的还是殖民地历史传统上的,都怀有敌意”。^①可以想象,在这座小镇里的童年经历对贝克尔后来的成长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对边疆所怀有的天然情感,使他后来成为美国“边疆史学派”的重要人物;而且,一种从“边缘”立场出发的平等观念、反叛观念、保守观念、自然观念,时常或隐或现于他的作品、演讲与性格之中。

1893年,20岁的贝克尔离开滑铁卢,进入威斯康辛大学学习。威斯

^① William H. McNeill, “Carl Becker, Historian”, *The History Teacher*, Vol. 19, No. 1 (Nov., 1985), p. 89.

康辛大学位于爱荷华州东北威斯康辛州首府麦迪逊市。在这个从未离开过自己童年小镇的乡下大男孩的心目中,麦迪逊是个大城市,他对它充满“浪漫而迷人的幻想”。^① 贝克尔在威斯康辛大学断断续续度过了14年的学院时光——三年大学、两年研究生,辗转多年后,又于1907年从该校获得博士学位。在威斯康辛大学,有两位历史学家对贝克尔影响至深: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Charles Homer Haskins,1870—1937)与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 Jackson Turner,1861—1932)。

哈斯金斯是美国著名思想史家,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及威尔逊总统顾问。哈斯金斯以研究中世纪史为专长,在其研究中世纪的名著《12世纪文艺复兴》(*The Renaissance of the Twelfth Century*,1927)中,哈斯金斯质疑人们长期以来认为中世纪是“黑暗的时代”的观点,指出中世纪对近代文明的发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今天,这种观点已为学术界接受,并开始为国内史学界所熟悉。在威斯康辛大学,哈斯金斯指导过贝克尔。贝克尔在本书所收录的《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一文中用调侃的语调回忆说,“那一年我还是没有真正学历史,我只是受到感染,想学历史。这当然是特纳的错,而不是我自己的原因。(顺便说一下,也是哈斯金斯的错。……至于哈斯金斯,要说的还有很多。)”^②

相比之下,在威斯康辛大学,美国著名边疆学派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对贝克尔影响更大;在《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一文中,贝克尔对自己的这位导师表达了深厚的崇敬与怀念:

这个人以他的人格魅力对我们所有的人产生并且依然产生着影响。他给我们留下的某些挥之不去的印象,他作为一个具有高尚情操的绅士,通过机警的才智和良好的正直心给我们传输的某些美德,都依然塑造着我们的生命,并为我们的作品增添灵魂。……这个人身上一些弥足珍贵、感人至深的品质,一些高处不胜寒的人性精神,我无言以表!^③

① Carl Becker, *Everyman His Own Historian: Essays on History and Politics*, Quadrangle Paperbacks, 1966, p. 191.

② Carl Becker, *Everyman His Own Historian*, p. 195.

③ Carl Becker, *Everyman His Own Historian*, p. 232.

实际上,初入大学的贝克尔一开始对历史学并不抱多大的兴趣,甚至怀有抵触情绪。他选修历史课程,是冲着特纳来的。特纳在学生们中口碑不错,被戏谑地称为“老弗雷爹”。他的人格与学问都深深地影响着贝克尔。

特纳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同时也要求学生学会独立思考。作为教师,他的这种独立风格甚至让人误认为是不负责任;因为他从不干涉学生的研究,不给学生提供答案,不限定参考书,甚至有时上课会迟到,会开小差走神。但是,对于学生主动提出的问题和要求,他总能耐心细致地解答。在研究班(seminar)上,特纳似乎只是在“放羊”。但这位放牧者手中时刻握着一根鞭子,一旦发现哪只羊儿偏离了方向,他只需一个响鞭,就能将羊儿带回正路上。

在学问上特纳对贝克尔影响最深的,是他的“边疆史学”。实际上,边疆是一个超越地理之外的概念,更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相对而言,在19世纪末,不仅中部是东部的边疆,而且,美国本身仍然是欧洲的边疆、文明世界的边疆。“边疆如其说是一个区域,不如说是一个过程。”^①边疆并不意味着没有希望的蛮荒之地;相反,正是在不断的边疆拓展中,在新旧文化的碰撞中,培养了美国人的开拓精神。这是一种只有边疆才有的精神,是真正的“美国精神”。这就是特纳《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意义》这篇著名论文的基本思想。这种思想鼓舞了贝克尔,让他联想自己童年的边疆小镇,思考美利坚从殖民地到独立的历程。在他《革命的前夜》(*The Eve of the Revolution*, 1918)、《论独立宣言:政治思想史研究》(*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A Study i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Ideas*, 1922)等关于美国革命的研究,无不渗透着这种思想逻辑。

1896年,贝克尔大学毕业,继续留在威斯康辛大学攻读硕士学位。1898年,贝克尔获得硕士学位后来纽约,在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院继续攻读哲学博士。在哥伦比亚大学,贝克尔又遇到了两位对自己的学术和思想发展影响至深的重要人物:詹姆斯·哈维·鲁宾逊(James Harvey Robinson, 1863—1936)与赫伯特·利瓦伊·奥斯古德(Herbert Levi Osgood, 1855—1918)。

^① Carl Becker, *Everyman His Own Historian*, p. 222.

鲁宾逊是美国“新史学派”的创始人，提倡历史学在研究对象与方法上都应该做出最大变革，要扩大历史研究的范围，扩充研究的方法，主张史学研究要为现实服务。长期以来，在美国史学界，占支配地位的是欧洲“兰克学派”的所谓“科学史学”研究方法，以及美国自班克洛夫特（George Bancroft, 1800—1891）以来的“进步史观”。“新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这一学术语境出现的。在本书所录《韦尔斯与“新史学”》一文中，贝克尔回忆说，鲁宾逊教授反对脱离现实的研究，他“哀叹历史学家浪费时间去考订‘胖王查理在公元 887 年 7 月 1 日到底是在英格尔海姆（Ingelheim）还是在鲁斯特瑙（Lustnau）’^①，要求他们改弦更张，去考察一下‘海德堡类人’的下巴。”^②在《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一文中，贝克尔也讽刺了这种“考据癖”的做法，主张历史学家应该把握住切实的研究主题，并提出自己的分析和见解。

在鲁宾逊的带领下，哥伦比亚大学形成了一批颇有影响力的“新史学”代表人物和研究。比如，巴恩斯（Harry Elmer Barnes, 1889—1968）关注欧洲的巫术和科技的发展历史，拓展了史学研究的范围；肖特威尔在美国劳工史方面的文献编撰和研究，推动了史学为现实服务。又比如，同样在哥伦比亚大学深受鲁宾逊影响的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查尔斯·A. 比尔德（Charles Austin Beard, 1874—1948），在其名著《美国宪法的经济观》中从经济角度解读美国宪政的根源；本书所录的《现代利维坦》一文，就是贝克尔对此书所写的书评，贝克尔对这种分析方法特别赞赏。而贝克尔本人关于《独立宣言》的著名研究，更是体现了“新史学”在选题、史料、方法、倾向上的这种风格；从某个侧面看，本书所录《1776 年精神》一文就是贝克尔对自己这项研究的回应和补充。

在哥伦比亚大学，贝克尔跟随鲁宾逊研修宪政史、欧洲史、国际法和美国历史等课程。1937 年，他回忆说，“1898 年，我选修了詹姆斯·哈维·鲁宾逊的 18 世纪思想史课程，地点在哥大旧图书馆，每周一个晚上。教授讲得如此生动有趣，以至于我们连记笔记都忘了。他有才华；他的幽

① 公元 887 年，法兰克王国最后一个国王查理（绰号“胖子”）被废黜，统一的法兰克国家再次分裂。历史学家认为，他当时身在何地将对后世法国疆域的沿革具有象征意义。后文的“海德堡类人”是指 1907 年人类学家在德国海德堡附近的毛尔（Mauer）地区发现的史前人类。

② Carl Becker, *Everyman His Own Historian*, p. 172.

默感是朴素而富有感染力的;他传达的信息是令人震惊的、不带学究气的,我从任何教科书和正规史学著作里从没看到过。但是,在他的面色中,有一丝忧伤;他有一种气质,一半属于悲伤,一半属于顺从;他的语调让即便是最简单的事实陈述也变得有趣、发人深省,或者既有趣又发人深省。”^①

实际上,鲁宾逊对自己的这位哥大弟子一直给予很高评价。他给贝克尔写过热情洋溢的信,在1899年,鲁宾逊写道,“我很高兴地说,你在我的指导下所做的研究是完全令人满意的。你在研讨会上的那些报告显示你的勤奋与见解,这充分证明了你已经很好地掌握了史学研究方法。”^②贝克尔与鲁宾逊保持着长期的交往,他后来关于18世纪欧洲启蒙“哲学家”^③的研究,一直得到鲁宾逊的关注和启发。当时,鲁宾逊已经接受了哈斯金斯对中世纪“黑暗”性以及教会反科学性的否定,这种态度进一步影响到了贝克尔,贝克尔设想将启蒙“哲学家”解释为“不是基督徒的基督徒”(Christians-not-Christian),这后来成为他著名的《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的主题。

1899年,贝克尔离开哥伦比亚大学,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谋到一个相当于讲师的教学职位,同时将自己的博士学位申请转回到威斯康辛大学。1901年,贝克尔结婚,妻子名叫莫德·赫普沃斯·兰尼(Maude Hepworth Ranney),她是一位寡妇,与贝克尔生有一子。实际上,早在威斯康辛贝克尔就与妻子相识,但由于性格羞涩,差点错过这段姻缘。随后几年间,贝克尔先后在达特茅思(Dartmouth)、明尼苏达等地做教师。贝克尔此时已届而立之年,但仍然性情腼腆。他不能很好地驾驭课堂和学生,他的教职生涯并不被人看好。

1902年,贝克尔来到堪萨斯大学任教。这次他终于稳定下来,直到1916年,在这里共生活了14年之久。贝克尔对堪萨斯一直怀有特殊的感情,称这片西部边疆土地为“亲爱的老堪萨斯”。堪萨斯与贝克尔的童年生活非常接近,他早年曾经想过去堪萨斯大学读本科。从本书所收录

① Henry Johnson, *The Other Side of Main Street* (New York, 1943), p. 162.

② James Harvey Robinson to Carl Becker, New York, September 3, 1899. 转引自 Burleigh Haylor Wilkins, *Carl Becker: A Biographical Study in American Intellectual Histor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61), p. 62.

③ *Philosophes*, 通常特指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家。

《论堪萨斯》一文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贝克尔对这片土地的深情。在贝克尔心目中，这片“蝗虫之地、干涸之地、不毛的社会试验场的土地”代表了一种特殊的“精神”。“堪萨斯精神是对美国精神的双倍提炼，是美国式个人主义、美国式理想主义以及美国式宽容精神的新的嫁接。堪萨斯就是美国的缩影：美国人在欧洲背景下考察自己，同样，堪萨斯人在美国背景下考察自己。”^①

1907年，他在威斯康辛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1908年，他在堪萨斯大学升任教授。在堪萨斯大学的14年间，贝克尔的主要努力集中在教学上。他逐渐适应了教师的角色，开始赢得学生及同行的尊重。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贝克尔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学风格。他说：“毫无疑问，大学应该直接关注现实问题。”贝克尔这种特立独行的作风，显然是由于受到了特纳的影响，同时也体现出“新史学”的“学以致用”倾向。

这期间，贝克尔发表了一些论文及书评文章，包括本书所录的《论堪萨斯》(1910)以及《朱丽叶·德鲁埃与维克多·雨果》(1914)。1908年，他的博士论文出版，题为《1766年至1775年间纽约地区的政治派别》(*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Province of New York, 1766-75*)。1915年，贝克尔出版《美国人民的形成》(*The Beginning of the American People*)。在这些早期著述中，贝克尔开始思考历史学的本质以及历史学家的使命，并且是从边疆、从欧洲、甚至是从人性的角度去思考。

1916年，贝克尔应邀到康奈尔大学任终身教授，一直到1945年去世。这30年是贝克尔一生最重要的学术活动时期，也是他的思想形成时期。

1918年，贝克尔发表《革命的前夜》。这本书可以说是贝克尔的第一部思想史研究著作，标志着他开始摆脱辉格派史学“技术史”(technical history)的缺陷^②，转而重视思想对于美国革命的推动作用。他提出一个假设：观念，不论是历史观念还是政治哲学观念，要比那些经过加工提炼的或者说绝对的事实更能起到理性化的作用。据此他认为，在美国革命前夕，“爱国者们”发现洛克对1688年“光荣革命”的辩护是有用的，他们购买、阅读、收藏和传播这类书籍和观念，推动了革命的到来。由于这种

① Carl Becker, *Everyman His Own Historian*, p. 27.

② Carl Becker's review of Butterfield, "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IV (June, 1932), pp. 278-279.

突破性的思想史研究,《革命的前夜》为贝克尔带来的很大的成功。此书当时热销到四万本之多,而且好评不断。

《合众国:一场民主试验》(*The United States: An Experiment in Democracy*, 1920)是对《革命的前夜》的深入:它进一步将思想史分析方法具体运用到对美国民主的历史解释上。应该说,贝克尔对美国的民主一直怀有坚定的信仰,他所做的历史研究,总体上都是为了为美国民主赋予思想史的、而非迷信式的基础。在《合众国》中,贝克尔分析了一些可能会影响人们对民主的信仰的因素,如“民主与自由土地”、“民主与移民”。贝克尔在这里追随特纳的方法,认为边疆新开辟的自由土地,对美国式民主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论独立宣言:政治思想史研究》是贝克尔一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近些年,它已为国内学界熟知,并已经有彭刚先生的中译本问世,被视为《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The Heavenly City of the 18th-Century Philosophers*, 1932)之“姊妹篇”。^① 贝克尔用文本比较的方法,对《独立宣言》起草过程中的不同版本进行解读,但是他的目的不在于指出哪个版本的内容是最真实的、哪个版本的主张是最正确的;相反,他指出,“《独立宣言》里的自然权利学说是非对错,这个问题根本没有意义”。有意义的是,人们在当时需要这种学说。“当诚实的人们被迫不再效忠于某一群体既定的法律或习俗时,当他们进一步地认为这样的法律和习俗那恶得不能再忍受时,他们就会去寻找某种比该群体既定的法律和习俗更为普遍有效的原则、某种具有更高权威的‘法律’。借助于这种更高级的法律或者更为普遍有效的原则,他们就使得他们那些被该群体指斥为不义的和犯罪的行为合理化了。”无怪乎,“19世纪几乎是堂而皇之地拒绝从《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所表达的自然权利的哲学中,推演出多数人的权利来,这一点颇为意味深长”。^② 可以说,《论独立宣言》修正了人们关于权利学说与革命的关系的想象,因此一直受到重视。

如果说《论独立宣言》修正了人们的某些历史想象,那么可以说,《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颠覆了人们的某些历史逻辑。贝克尔在此书中指

① 卡尔·贝克尔:《论独立宣言:政治思想史研究》,彭刚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在此单行本之前,曾收入卡尔·贝克尔:《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何兆武等译,三联书店,2001年。

② 卡尔·贝克尔:《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第317页。

出,18世纪的启蒙“哲学家”反对奥古斯丁的“天城”,其实他们所做的工作“只不过是新的材料在重新建造另一座中世纪奥古斯丁式的‘天城’而已。”^①他们反对宗教崇拜,却重新陷入对理性的崇拜。进一步而言,中世纪在迷信与崇拜之外,也有科学与理性,而18世纪对科学与理性的提倡,其思想模式仍然是信仰式的;在这个意义上,18世纪与现代的关系远不如18世纪与中世纪的关系更为密切。在这样的分析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其业师、中世纪研究专家哈斯金斯的影子,而且看到了贝克尔关于“新史学”的反思。从本书所录《亨利·亚当斯的教育》、《再论亨利·亚当斯》以及《韦尔斯与“新史学”》中,可以看出,贝克尔“对亨利·亚当斯以及H. G. 韦尔斯的预言风格较感兴趣,只不过他反对亨利·亚当斯的悲观主义,赞同H. G. 韦尔斯的乐观主义”。^②笔者认为,贝克尔将中世纪投影到18世纪,又将18世纪投影到他所处的1930年代,将1930年代投影到未来,这体现的是“新史学”的实用主义与相对主义的历史观。从史学史上看,《天城》的意义正在于此。

值得一提的是,《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实际上是一部演讲结集,由贝克尔1931年4月在耶鲁大学所作的四次演讲于次年结集出版而成。与贝克尔的大多数著作(除了其博士论文)一样,这部著作是在很短时间内完成的;但是,贝克尔关于相关问题的思考是一贯的。第一章“舆论的气候”源于他对当时著名思想家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 1861—1947)所提出的这一概念的思考。第二章“自然法与自然界的上帝”在很多地方与他早先的《论独立宣言》有相似之处。第三章“新史学:用前例教哲学”源于贝克尔对历史编纂学的思考,以及他与鲁宾逊等“历史哲学家”的长期联系。最后一章“对于后世的运用”反映了贝克尔本人关于后人应该如何评判前人的思考,这与他关于罗兰夫人的研究(见本书所录《罗兰夫人的回忆录与信件》)也是一致的。难怪,当时有学者指出,贝克尔此书“没有什么特别令人惊奇或新颖之处”。^③

① 卡尔·贝克尔:《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何兆武,“译序”。

② Burleigh Taylor Wilkins, *Carl Becker* (MIT Press, 1961), p. 174.

③ Adrain Coates, *Philosophy*, VIII (October, 1933), pp. 495-496. 转引自 Burleigh Taylor Wilkins, *Carl Becker: A Biographical Study in American Intellectual Histor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61), p. 178.